

我思，谁在？

舒 芜著

思想者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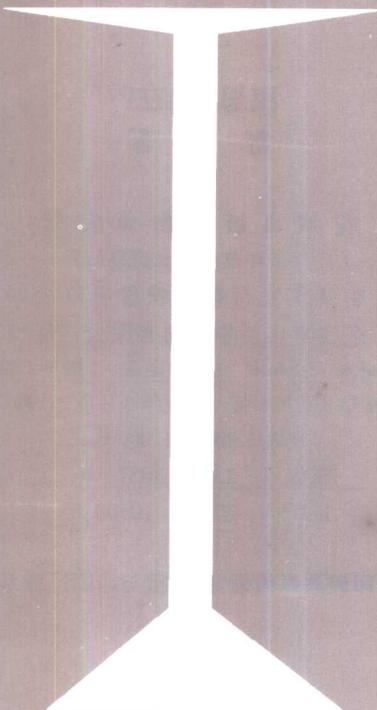
花 城 出 版 社

我思，谁在？

舒 芜著

思想者文库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思,谁在? /舒芜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
(思想者文库)

ISBN 7-5360-3057-6

I. 我… II. 舒…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027 号

我思,谁在?

舒 芜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1 插页 320,000 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0—11,000 册

ISBN 7-5360-3057-6

I·2584 定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我们在策划这一部丛书的时候，向一些作者发出了~~一封约稿信~~，其中说：

“我们这部丛书回避了‘思想家’这个提法，而用‘思想者’，还不单是为了谦逊。我们不要求我们的作者都如同思想史上的那些思想家一样，都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原创性的思想。我们自负的是，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在不断地思考历史和现实，传统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社会与文化等等这些题目。他们的作品，也是在引导和启发读者思考这些题目的。编印这样一部丛书的意图，想必可以得到您的赞同吧。”

“我们从平日阅读的印象中，觉得您是一位在深思着的作者，所以冒昧相邀，如蒙俯允，不胜荣幸。”

“我们想每册字数二十万至二十五万，基本上从已发表的作品中选录，最好是发表之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者。不论是否已编入文集，均可选录。只要围绕着‘思想者’这根主轴，论文、笔记、随笔、杂文均可入选。倘有未发表过的合适的新作亦可编入，但不作为一项要求。”

这丛书的编辑意图和编辑办法就是这些。

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应该是独特的，既然号称思想者，就不会与别人雷同。丛书的每一位作者，他思考的范围、题目，他思想的倾向，都各各不同。因此，每一位作者只对他自己的这一本书负责，不对丛书中其他作者的书负责。每人发表的都是自己的意见，并不表示这些意见全是编者和出版社赞同的。

第一批推出六种。假如读书界愿意接受这丛书，我们想接着再编印若干种。我们看见，在这世纪之交，在思考着这些题目的，并不是只有少数人。

朱正 秦颖

1999年3月18日

MA76/OP

《我思，谁在？》题记

“我思，故我在。”

我思了，我在么？在的是我还是别的谁人？却是个问题。

这本集子，是从我历年已发表的旧作中选出来的。有论文，有杂文，有漫谈随笔，品种不一，但取其都是有关思想的。这是朱正兄出主意要我编的。我病了，无力编，索性请朱正兄全权代编，真谢谢他。

我这样思了，我在么？在的是我还是别的谁人？也许读者会看得清楚，还希望读者告诉我。

舒 芜

1998年12月4日

序

后世研究我们这一代的思想史或者思想斗争史的时候，都不能不遇到舒芜这个名字。

当一个署名舒芜的作者出现在著作界的时候，他拿出来的，是《论主观》等几篇哲学论文。这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抱负甚大，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尚未继承的前代哲学遗产继承下来，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当时思想文化界的重镇胡风对他也期许甚高，在给他的信中说：“今天，思想工作是广义的启蒙运动。”希望他为这广义的启蒙运动做些工作，建议他写一本哲学入门的小册子，以取代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这本哲学入门书虽然已经着手，最后却著没有写成。这并不是一件可惋惜的事。那时舒芜和艾思奇可说是属牙相同的思想体系，有什么必要去取代《大众哲学》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论主观》吧。这是一篇哲学论文，我觉得其中有不少地方是用哲学的范畴来谈政治。例如谈到主观作用本身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类开始获得主观作用，而客观世界还都是敌人”。说的岂不就是原始社会么。“第五个阶段，主观作用本身已由于许多巨大的自然敌人之被征服而强大起来；社会势力也享受到这战果而同样强大起来；两强不能并，于是前述的矛盾就从此展开。”说的岂不就是阶级社会么。“第三个阶段，……人类的主观作用，就成了不但最进步而且最强有力的东西。从此就可以所向无阻的向全部自然敌人进军。”这说的岂不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么。

“我们现在，正是这第二阶段的终端。”说的岂不就是正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么。“别个事业已经成功的国家”，说的岂不就是苏联么。“那对于主观作用的一般的本性和自己的具体的主观作用之丰富的内容与强大的力量都具有极其清楚而且深刻的认识的人们已经产生出来了。他们是谁？就是第二阶段中那独独能够保持并发展主观作用的创造变革性的人们的最优秀的后代。”说的岂不就是苏联、中国和各国的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么。文章还大谈“卡尔对于新哲学的创始工作”，大谈哲学的“伊里奇阶段”和“约瑟夫阶段”，说约瑟夫所强调的“认识的党派性”是“最高原则”。这篇文章，不论在哲学方面应该怎样评价，至少，政治态度应该说是很可取的吧。可是不然。延安方面认为这属于那种“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唯心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引起一场不休的批评。

今天看起来，卡尔和伊里奇，当然有他们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至于约瑟夫，已经有另外的头衔，大约不会再有人谈他的哲学了。当年一本正经的谈论哲学的约瑟夫阶段（最早不是舒芜，而是另外一位哲学家或曰哲学史家提出来的），还以为是广义的启蒙哩，真是可悲悯的蒙昧啊。

但不论怎么说，《论主观》的发表和因此引起的风波，是当年思想界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因此，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标本而存在下去：第一，这种思想体系包括它的约瑟夫阶段，曾经怎样强有力地吸引一代好学深思的年轻人；第二，完全接受并且努力宣传这种思想体系的文章，只要不合某些人的心意，也会受到批评。就作者本人来说，这一篇既反映了他早年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反映了他的缺陷。将它作为这本集子的第一篇，应该说是适当的吧。

舒芜写作甚勤。他的作品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都很受重视。可是，有些人在谈到他的这些成就的时候，常常流露出了惋惜的心

情，众所周知，这是因为他胡风冤案中所起的作用。有人说培根又怎样，歌德又怎样，似乎学术史上、文学史上这些著名人物的生活中也不全是无可非议的。还有论者因为舒芜在周作人研究方面的成绩，将二人相提并论，以为反映了某种负疚的心态。我没有研究过培根与歌德的传记，不知道要怎么说，至于拿周作人来比拟，我以为是完全不适当的。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当了汉奸，“通谋敌国，谋图反抗本国”，这不必要到后世去论定，当时人人都知道这是不能做的。而舒芜呢，就从他的《论主观》所表示的政治态度，他在那时就是拥护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拥护苏联，拥护共产主义（他写作“抗谬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国解放，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是心悦诚服的服膺毛泽东思想，心悦诚服地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终于一步一步走上了后来的道路。简单的说：周作人是投降了“恶”，舒芜是归顺了“善”，这里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当然，这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可是不但是他，就是像周恩来这样领导核心中的人物，也都是始料不及的。跟胡风和舒芜都有很深友情的聂绀弩在给他的信中说：“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我这样说，并没有原谅这件事的意思。其实舒芜也没有原谅他自己。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中沉痛地说：“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

我思，谁在？

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他表示，要“向历史把这份沉重的责任永远铭记下来”。看了这些悔恨的自责，人们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惋惜之感呢。

作为一个思想者，舒芜的一小部分文章选印在这里。读者可以依自己的见解去阅读和评论，作为编选者本来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只想提出一点，他大约是周作人之后（又是周作人！）对妇女的命运，妇女的苦难，妇女的地位，妇女的权利思考得最多，也写得最多的作者，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

朱 正
1999年3月19日，长沙

寂寞心情好著书

还是八年前，我在《鲁迅研究月刊》做编辑。那时常读到舒芜先生的来稿，字写得很秀雅，漂漂亮亮，文章又好，是很受读者夸讲的。后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舒芜文学评论选》等书出版了，学术界对其成就很是认可。舒芜是个学识很深的人，读现代文学史，这个名字会引出一串的故事，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也罢，但其在文学史上特殊的位置，是很值得人们思量再三的。

舒芜是个有特点的理论家。不仅国学很有根底，在新学上，一直有自己的追求。他一生一直处于文坛与学界之间，既不像同代一些作家那么思维单调，又无书斋里的学究那样的老气。他和“七月派”以及五四后几代学人间复杂的精神联系，使他在中国文化界，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五十年代，因胡风事件，舒芜在中国家喻户晓，一些文人至今仍对其耿耿于怀。但不久，他便被打成“右派”，此后一直过着悲惨的日子。直到现在，他还处于社会的边缘，用“半生寂寞”形容他，大概是恰当的。

我对舒芜的书读得有限，除了那本《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串味读书》、《未免有情》外，对其知之甚少。但这是几本很值得重视的书，那里含着一个人的生命史，和一个文化老人对世人的警言。舒芜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经历（中国有他这样经历的读书人是很多的），还在于他对自己经过的历史的一种文化态度。“右派”学者中，像他那样一直注重对弱小知识分子命运研究的人不多。他似乎早就超越了对己身苦运的恩恩怨怨式的打量，而

是将目光，深入到对一种文化命题的深切的关怀里。无论是周作人研究，还是对五四文化的思索，舒芜都别于当下的一些学人，他几乎是带着生命的一切光热，沉于其中，那其中，也有抉心自食的创痛吧？许多老人，并不谅解舒芜这一点，至今仍以道德之尺视之，其实是大谬的。舒芜在寂寞里苦苦思考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表达方式，是有很深的文化含量的，这总比简单的价值判断，要有精神的力度。这力度固然还不及“五四”那代人强大，但在他身上体现出这类情怀，我们还是要感谢他的。

记得舒芜成名之作，是那篇洋洋洒洒的《论主观》，哲学的思辨力，不让于他人。他后来也弄过一段古典文化，其修养，被聂绀弩等人所赞佩过。晚年，他致力于对中国新文化史的研究，其随笔的调子，老到沉稳，渐有知堂遗绪，读来亦多性情。但那深处，像有丝丝隐痛，精神的苦楚，是不言而喻的。他的文章，其实很少闲适之色，几乎看不到“悠然见南山”的雅趣。在看似轻松的笔致里，有很沉重的话语。这和青年时代激昂的文字比，已有很大的不同了。

我一直注意到他对“士”阶层的研究文章，有许多，写的是好的。《忆台静农先生》、《忆杨荣国教授》、《让那伐木者醒来》、《记聂绀弩诗遗札》等。篇篇有味儿，是他文章中的上品。《串味读书》中有许多短章颇可一读，情感，知识，思想在此融得自然得当，殊为难得。舒芜的作品，记人、记事、记书，调式多样，是当代杂学家重要的一位。他对中国“士”阶层尴尬地位的体悟，对文化变迁中，知识阶级悖谬心态的把握，均直射着自己的觉态。他的周作人研究，现在看来，依然很透辟，流淌着几代知识者的苦梦，这一点，他同代人中，有许多人是做不到的，为什么会进入得这么深？他的独语何以显得沉郁悲凉？我觉得都有让人回味的地方。

中国是个道学气很重的国度，以道学视人，挂一漏万不说，

在文化上，便显得很无气量。舒芜的经历，无疑是个悲剧，但他对道学传统的体味和痛恨，以及对此所产生的畸形文化人格的反省，都是有意味的。虽说他的深度会比五四那代人高出几许来，——他晚年实际上一直生活在鲁迅，周作人，胡适的传统里——但他从心灵深处发出的对弱小知识分子命运多厄的感叹，不能说没有力度。

这使他对那些充满矛盾的知识者充满了同情，他不会像世俗流行色那样，去打量复杂的文化现象，将问题简单化。如，对周作人、杨荣国这样在别人看来失节的人，他有另一番体会。《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便有一种宽厚、多元的文化态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功与过，是与非，倘能从历史的角度探寻之，明辨之，当会有所收益的。不因人而废言，是舒芜思想中很重要的元素。自然，他在此也常常陷入困顿，反对道统，但也并非没有道统的影子，这不仅是他，而且也是我们这代人常出现的矛盾。不过，舒芜一直警惕着自己不要重蹈前人的覆辙，用边缘化的心态去审察文化主流中的东西，其价值是难得的。他在周作人研究上的成就，也许正得力于这一心境。

我翻阅他的著作，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对周作人某些学术观点的呼应，有些问题的思考，是有分寸的。例如女权问题，周作人曾谈过许多，舒芜也乐于此道。周作人在文艺美学上的观点，大概也影响了他，或说两人有同感之处也是对的。不过舒芜不同于周氏的地方是，对花鸟草虫趣味不大，文学上也不去搞什么旗帜和口号，他似乎还带着三四十年代文人的余光，忧世很深，对学理的热情超过了玩赏自娱。“苦雨斋”式的小品心态似乎少了许多。舒芜本身是入世的，不过屡屡受挫而无自由表达的时机罢了。看他在王瑶逝世时写下的挽联，悼念荒芜的悲怆的短文，均写得苍凉哀切，不是深味世态的人，大约写不出这类的文字。舒芜之作常常是哀世之音，像个久违了故地而长吁短叹的老人，内

中表达的，是无量的苦楚。他之钟情于五四那代人，从青年时代的政治热情隐退到学人的独立精神中，是那代人文化选择的一个特例。而不是这一点，他和九十年代的一些青年学子，有了深切的联系。既未停在旧路上，又未以权威姿态居于文坛。舒芜是寂寞的。他的文字有着独自面壁时的冷寂，也多有孤苦无援的无奈。读他的随笔，不是浮躁的表演，我从中听出了他内心的苦诉。一个近于被遗忘的人，不求闻达于世，精神又要有所追求，那文字，便沉甸甸了。舒芜的一些文章所以好看，原因大概便在这里。

好像是沈兼士说过的，“寂寞心情好著书”。此话移于舒芜，是不错的。一个久经苦难的人，能在孤独中不自沉下去，还孜孜不倦地求索着，对今人和后人，都是件益事。舒芜的书未必本本精当，他的内省精神也似不及巴金那么感人，但作为一个学人，在学理上不退步，而是一直有一种怀疑精神和不满中的追求意识，我们对他则不能不表示尊重。我以为他的文字的价值，在文学史上是特别的。

孙 郁
1999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我思，谁在？》题记	舒芜	(1)
序	朱正	(1)
寂寞心情好著书	孙郁	(5)
论主观		(1)
论中庸		(36)
更向前		(87)
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	高岗	(99)
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	高岗	(111)
个人、历史与人民	高岗	(127)
鲁迅在城市中战斗	高岗	(158)
“隐晦曲折”辨	高岗	(163)
周作人概观	高岗	(168)
“谁解其中味？”		(235)
女性的发现		(264)
——周作人的妇女论		
关于女性意识和政治、社会意识的思考		(311)
“香草美人”的奥秘		(320)
古中国的妇女的命运		(329)

不仅是封建的账	(338)
男借女尸还魂	(347)
看看这个标本	(353)
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	(358)
从“俊卿兄”到“闻氏”	(364)
辱与死	(367)
扈三娘的教训	(370)
中西女勘通观	(374)
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么？	(377)
“奸人妻女”质疑	(382)
重唤夏娃	(384)
说“难免”	(388)
（附：也说难免）	柳小如
三说“难免”	(392)
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395)
重读《彼得·潘》	(403)
猴子的长尾和皇帝的圣讳	(407)
知言乃可论史	(414)
养蛊遗法	(423)

论 主 观

—

我们这时代中，许多新哲学者，对于“主观”这一范畴，还具有颇为混乱的理解，而这种混乱，就整个历史发展的现实而论，是不应该有的；就新哲学本身所已发展到达的阶段而论，尤其是不应该有的。

新哲学是随从着反映着并指导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而因以取得它本身的不断发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新哲学在今天，由于约瑟夫的伟大的战斗实践，已被提高而进入了通常所谓“约瑟夫阶段”，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所谓约瑟夫阶段，反映着历史新高形式而作为其特质的，就正是对于主观作用的强调；换言之，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地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因此，我们认识里面关于它的混乱，就必须从速加以澄清。

但是，新哲学的发展，无论如何都不会从它自己的基本原则离开；在它自己的基本原则里不曾和不能涵蕴的东西，无论哪位导师也无法凭空地引进来。所以，把“对主观作用的充分强调”了解为约瑟夫阶段的特质，并不表示此阶段以前的新哲学里都是轻视乃至无视了主观作用。恰正相反，新哲学的创始人，就正是通过对于主观作用的深刻把握，而把自己决然地从费尔巴哈分开了，遂使新哲学第一次在正式意义上出现的。